

# 弥合现代性“断裂”： 中华诗教之“反脱域”机制

李 勇 李 姣

**【摘要】**伴随现代性之进程,文化与文明在时代转型中与传统发生了断裂。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眼中,断裂所以发生,源于现代性“脱域”机制日积月累的影响。现代文明建设非直接引发断裂,它先导生脱域,继而影响文化与文明走向。这一社会学问题所以被关联至诗“学”领域,并将诗歌与诗教话题重新拎起,乃源于其“反脱域”机制在修复与疗治此“断裂”时所可能发挥的积极性与建设性的价值。换言之,在疗治现代性所导致的文化与文明断裂问题上,作为对吉登斯理论的反向演绎,中华诗教的“反脱域”机制在学理上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与方案。

**【关键词】**中华诗教;“反脱域”;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断裂”;脱域

**【作者简介】**李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媒介理论研究(天津 300071);李姣,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河南 郑州 450046)。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24.3.30~4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19BXW042)。

今天,文化与文明语境的“断裂”问题是人们感伤、讨论、反思与研究的重要议题。安东尼·吉登斯在此问题上见解独特,他抓到了“脱域”这个现代性的重要动力问题,认为脱域是导致文化与文明在时代转型(transformation<sup>①</sup>)中发生“断裂”(discontinuities)的始动因素。吉登斯以此思考现代性的运行机制,其落点与目的在现代性这个“难以驾驭的庞然怪兽”(juggernaut)<sup>②</sup>不可控的后果(如风险等)上。但现代性之断裂有无修复可能,如何修复,则未论及,可能原因是当时在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时尚未现出思考之契机。学理上讲,修复断裂使其复原如初显然无法做到,但针对“脱域”这个导致传统断裂的动力问题的“反”方向施力,可能有助于缓和因断裂而生的诸多文化、社会问题。而“反脱域”,作为对吉登斯理论的化用与反向演绎,正体现出中华诗“学”、诗教的重要

机制与精神。诗歌与诗教之重被拎出,即源于其学理上在修复与疗治此断裂时所可能发挥的积极性与建设性的价值。

## 一、脱域

“脱域”(disembedding)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概念,《现代性的后果》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所谓“脱域”,“是社会关系从双方具体互动的地域化语境(local contexts of interaction)中‘脱离’或‘提取’出来(lifting out),并在无限时空场域中重建社会关系”<sup>③</sup>。脱域问题之所以成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影响其发展方向,并成为现代性之核心概念,与其内在对文化、社会发生影响的施力机制相关。

其一,脱域的核心机制在抽象化,即从具体情境中抽取、析解出通约性符号而将具体“物”“象”及其发生语境丢开。如小女孩给父亲开玩笑,指着食指

问这是什么,爸爸说“1”,小女孩摇头,说这是手指<sup>④</sup>,又问爱因斯坦为何不用它来弹钢琴,父亲迷惑,女孩揭开谜底:因为这是我的手指头,不是爱因斯坦先生的,所以他无法用啊。这个笑话形象道出了成人思维之特点乃在于认知的抽象化机制,而抽象化即脱域化。当然,吉登斯“脱域”概念主要针对现代性中时间从空间、空间(space)从地域(place)分离的现象而言,前者如钟表,统一时间同时也使“时间虚化”(emptying of time)<sup>⑤</sup>;后者如地图,造成如缺场、远距关系等非地方化(dis-places)<sup>⑥</sup>现象,从而使“空间虚化”(emptying of space)<sup>⑦</sup>。他所列举的两种脱域类型“象征体系”(symbolic tokens)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之核心机制即在于此,二者之本质乃无时空束缚之“抽象性体系”(abstract systems)。<sup>⑧</sup>其二,脱域的始发环节在时一空分离,也即时间与空间的相离、相脱。时间总是与地域相联,因地域而生差异。如美国19世纪80年代前有56个时间标准,各地都有自己的时间——“太阳时”,“按照正午太阳直射头顶的时间来设置时钟”<sup>⑨</sup>,这给铁路管理带来麻烦,由此促发计时方式的变革。统一的计时标准使时间脱离空间(即头顶太阳)束缚,使地域抽象为标准化的“时区”,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时间因之获得统一。<sup>⑩</sup>站在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下,美国1883年这次标准时间的设立划时代地“改变了整个地球报时方式”<sup>⑪</sup>。时间从地域性束缚中分离是脱域的“首要条件”<sup>⑫</sup>,其升级形态则是“将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从地域化语境中‘剥离出来’”,从具体时空的情景化束缚中摆脱,从而提取出规则,使之“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重组社会关系”,这一步是“脱域”的核心环节。<sup>⑬</sup>其三,时一空伸延。“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既派生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更重要的在于“其形式上的重组”<sup>⑭</sup>,也即借助脱域方式“极大地拓展了时空延展的范围”<sup>⑮</sup>,从而使先前从具体情境中抽取出的符号与规则进入更大范围时空领域,以重组社会关系。这一时空扩展最

终促成全球化,即将地方连在全球之上,如吉登斯所说,“各类脱域制度(disembedded institutions)将本地化实践(local practices)与全球化社会关系(globalised social relations)连接起来,组织着例行生活的主要方面”<sup>⑯</sup>,“远距关系”(distanciated relations)效应因而在脱域机制带动下凸显出来,“域的”(local)同时成为“球的”(global),“本地生活实践”因而在不经意间被打上各类“远距因素”之印记,受到“世界货币与市场秩序”等远方“大手”或明或暗的影响与操控<sup>⑰</sup>。

以上三点是理解脱域作为驱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也即“现代性的重要动力来源”之关键。<sup>⑱</sup>只有经过这些环节,才可能找到社会“机器”在更大的空间与语境下建立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的可能性,生出更大的协调力、动员力,并引发相应的现代性“后果”。

## 二、断裂

与传统相比,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在脱离其生发的时空“具体情境”(specific time-space contexts)<sup>⑲</sup>后所组建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呈现出根本性与结构性的差异,并“日积月累”沉淀为文化与文明断裂。这点正是理解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间发生断裂的基本入手点,从资本社会、(后)工业社会、全球社会、消费社会、图像社会、科技社会、传媒社会等现代社会诸形态与传统农业社会、文字社会、手工业社会之差异与非连续性在字面上的呈现可见一斑。这里,我们谨慎使用的“日积月累”在吉登斯那儿显得保守了,他认为“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而导生的断裂”事实上速度很快,俨然闪电战一般;范围也很广,“全球各个角落无所不及”;且具内在迥异的全新特征与“社会形态”,“在先前历史时期里很难找得到”,如现代城市的构建“与前现代在组织原则上几乎没有丝毫相仿迹象”,似乎是“本有之属性”。<sup>⑳</sup>

当然,这也印证了现代文化、文明之断裂其实有

内在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源于现代性谋求发展的欲望,背后是工具理性对信息流通和社会组织高效开展及对利益无止境索取之驱动。欲望怀着难以遏制的自我实现的力量,构成前行的特殊动力,并将路上(几乎所有)阻碍性与束缚性力量驱除。这些阻束性要素主要有空间性与时间性两类,就前者而言,脱域之“先锋队”首要解决与“斩杀”的便是地域之束缚。全球化与“球域化”(glocalizaion)<sup>①</sup>之生成宣告空间层面现代性力量的解束与突围。“域”深层关联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秩序的构建。传统强调“域”,现代性则强调“脱”离、抽出,从而形成对立的和全新的组织方式,熟人社区因而渐变为陌生人社会,各类符号与“专家体系”背后的“信任”(trust)机制微妙而复杂地贯穿于社会体系的各个区间,传统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体系越来越抽象化、复杂化,几乎全异于传统。如“现代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在形式上都不相同”,具有“独特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我们从所有传统类型的社会轨道中卷离”。<sup>②</sup>有了这些与传统的区别,域的问题因而从单纯的空间问题进入并兼具时间性迭代维度。就后者而言,时间性障碍主要体现为传统所具有的在知识与观念层面巨大的惯性力、绵延力与惰性力,传统往往意味着规矩、框架、束缚,因而捆绑手脚,而现代性所欲致力的正在于斩断其与传统之关联,“将社会生活从传统恒定的束缚中游离出来”<sup>③</sup>,摆脱传统成规的前要求与无声的训诫和规定。但切断与传统的绳索(即知识传承)不是容易之事。让人意外的是现代性竟然切割得干净利落。其中关键的解锁秘诀在于知识接受中反思性精神的注入,“通过知识输入,对个体与群体行为产生持续性影响,从而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排序与再排序”<sup>④</sup>。这样,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被强化”,知识的确定性由是被削弱,其所携带的强制性与束缚性随之弱化,知识的走向逐渐脱离既有生产秩序,呈现出某种非连续性

与断裂性,继而不断积淀,产生影响,并从传统知识强大的束缚力中解除出来,走向对传统的乖离与断裂。文化反哺现象及后喻文化对前喻文化之取代即表征知识的来源与权威性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年龄上时间性的逆序重组。

站在吉登斯理论基础之上,就脱域之具体影响机制而言,其导致文化遗产与文明发展发生断裂问题中有两点甚为关键。首先,脱域的直接后果,导致信息与文化的快速流通、交换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整体的加速主义趋向。加速主义是近年来谈论较多的话题,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直接后果是全球化,折射到文化层面则为快文化之盛行。先看前者,全球化导致社会流动性加快,产生更多的传统所没有的远距化的“球”与“域”的连接。因为不受具体情境羁绊,信息之交换可轻松到达更大时空阈限。这是构成鲍曼所谓现代性之“流动性”(“fluidity” or “liquidity”)的重要基础。没有围墙的信息传速是惊人的,贸易与文化在失去地域壁垒的保护与规定后,地区被连接至全球,如超市“奇迹般地”将全球性以商品形式汇聚在地方性空间之内,“本地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远距关系在地化情景的一个表达(a locally-situated expression)”<sup>⑤</sup>。新的连接与流速的加快,与传统乡土社会等立基于静态与短距化连接方式的社会形态产生出根本性差异并引发“断裂”。

就后者而言,伴随着全球化,加速主义成为文化生产、生活的节律背景,快文化因而轻松取代传统慢文化,成为文化的基本语速。这一取代是导致文化发生断裂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发生断裂的表现。速度加快,人就会感觉可把握的空间增大了,主体性幻觉由是出现,而物则被简化、抽象化,走马观花式的观看方式对物产生出幻觉性的全景把握效果,涵养出一种不及物的观看习惯,好像掌握了物,其实远未“到达”,并未“及”物。如快餐旅游,看似游过很多地方与风景,其实并未把握到当地风土人情,对脚下

大地并未产生真切经验,常常不过是徒增“到此一游”的谈资罢了。更重要的是,加速导致“无域感”(如梅罗维茨所谓“no sense of place”),即无地域差异感,神经在不同地域的频繁游动与变换中所生之差异感渐被同化。伴随这种感觉的常常是“切近”(或译“亲近”<sup>②</sup>)的丧失(the frantic abolition)与“缺席”(absent),如海德格尔所说,“对距离的疯狂消除并未带来任何切近”<sup>③</sup>。所谓“切近”,乃人与物之间的交往温情,意味着“物”的“到达”“显现”,“立于自身,所谓自持(self-supporting)”,“四元”“统一”,“柔和地组合成世界,世界顺从地世界化”,从而使“物作为物”,“达到物自身”。<sup>④</sup>在文化与社会加速语境下,切近的流失其实是物性与诗性之丢失,是价值理性的失落,意味着人与“四元”,也即人与人一物、人一人相处之“境”的疏离,人的存在因而走向了离“域”后的悬空状态。自我因与世界及自身双重关系的破坏而走向分裂(schizoid),导致卢卡奇所谓“主体的分裂”<sup>⑤</sup>,或如拉英所谓“分裂的自我”(divided self),“分裂成两个或多个自我”,成为“过程的客体”(卢卡奇),“个体很难与他人及世界相处,只能在自我的孤寂与异化中感受与经验自我(experience himself)”。<sup>⑥</sup>这种自我的分裂感构成了感知时代断裂感的隐在前提与内向性回响。

其次,作为前述问题延伸之宏观效果,脱域导致抛离旧“域”(世界)重建新“域”。新旧两域主要差别在其与大地是否褒有直接的或有机的关联。旧域立于大地之上,与大地是和合统一的生态相生关系,域乃人之在世的舞台与世界,域先在于人,而人的出生、成长与生成乃源于域。新域则是悬离于大地之上的新建“域”场,其悬离与重建又分三阶段。第一阶段为抽象化阶段,在具象之上建立抽象体系,社会交换关系之场景由是从实在的具象情境进入象征交换的抽象体系。在此基础上进入第二阶段,人建立起庞大的符号秩序(如拉康之“象征界”),这一符号化

秩序而非实物、实域构成了社会组织方式与秩序的基础,这也正是吉登斯所谈现代性信任与专家体系等问题的基础,此为符号化阶段。第三阶段则更为根本,现代性致力于征服/改造自然,对自然文化化之后,如杰姆逊所言,对文化亦文化化,重建出一个过度的被反复文化化的世界,如今日之图像世界、传媒世界,以及由短视频、社交媒体,乃至虚拟现实、元宇宙、AI等共组的后结构主义视野中的拟像世界,这是一个彻底脱离大地之上的“非人”的媒介化世界。当代人深为之恹的“后真相”,即无法获得最终认知之真的原因即囿于此。柏拉图“伟大”的“理念”之思隔一层就无法贴近了,更何况当下之新“域”离开自然之本真有数层之隔。所以,新域,其实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吉登斯以“经济增长机制的崩塌”“极权的增长”“生态衰退与灾难”“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为例,认为这些都是“具有严重后果的现代性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s of modernity)。⑦当然吉登斯《现代性后果》出版于1990年,今天技术的发展又呈现出全新景象,人类追求速度、征服时空,俨然上帝一般,但在重建万物同时,也成就了一个“难以驾驭的社会巨机器”,人与社会因而在无法对之作出有效反馈与控制情况下出现结构性病变,如空前的风险与精神危机的加剧等。这构成了现代派文学与艺术的核心话题,如对抑郁症、精神病、虚无、荒诞感、精神生态与危机等异化问题的呈现与揭示。终极问题,也即意义和价值问题,作为一个曾经在哲学等领域和在作家陈述中极难撼动、未必要解决、但终需严肃面对的问题,如今被弃置一旁。意义的退场是价值理性失落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文化文明断裂的重要维度。另外,这个新域又构成了人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其过度文化化、拟像化之构建在客观上又斩断了人与大地本有之连接,成为一个空中楼阁式的世界并将人囚禁其中,使人屈从于新环境并陷入巨机器之运行逻辑,人在被动的跟随与顺应中被其

深深控制,这种不自主的屈从感是今天文明断裂感一个隐在的主观性构成。

时间上的加速主义与空间上“病态”化的新域背后其实是文化与文明过于偏重空间建设而忽略时间建设,由此导致时代结构性的“空间偏向”<sup>②</sup>以及时间建设与空间建设之失衡。当然,这是一个专门话题有待专文分析。此处提及旨在深入脱域之深层文化后果,即一味看重信息之抽象/脱域化流动,而忽视对时间在此域中流动之经验的细致体会与把握,看重社会交往、社会关联与组织效益(即能否转化为能量、资本与权力等方式),而忽略那些不考虑收益比的价值理性与生命感悟维度,就会导致生命、文化与文明建设天平中时空比之失衡,导致空间维度之偏倚与时间建设维度缺失后维系文化、文明现象传承之内在精神的断裂,导致快文化(如短视频)之肆行(空间建设需要快)与慢文化(体现时间建设精神)之难行,人在失去既往固定的存在依托与平衡后便会出现相应主体被“放大”或客体“简化”等系列病症。当然,也正是在此生活、文化与文明语境之断裂处,我们找出中华诗教,其在学理上恰有助于修复断裂、弥合衍生问题。

### 三、“反脱域”

理解中华诗教之对时代语境断裂的弥合/修复问题,可从其“反脱域”机制入手。“反脱域”是理解“诗”意精神之核心所在。如前文述,现代文明之脱域是将社会关系从具体时空(即“域”)中抽离,脱离“此时此地”,这样,具体事、象就被抽离出语境,悬于“域”外,感情因之抽象化、虚化,乃至异化。诗却不然,诗必须有“此时此地”,必须有“域”,换言之,诗必须是具身认知,也即有机体“具身”“嵌入”到所处环境之中,与环境互动,如此,真切之体验与诗性之认知在互动中便会生发出来。古典诗论提倡即景抒情,此时此刻的情融入此时此刻的景,此处“景”即是“域”,情须入景,重归于域,不能脱之、离之,且须“自

然而然”生于景“域”之中;于某个特定时刻见到明月想到故乡,见到河洲上关关雎鸠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到战争废墟中存留的花儿与鸣吟的鸟儿想到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看到大雁北归想到自己离家日久何日能返,看到一江春水想到家国愁绪……这样,情生于域、域孕生情,所谓情中含景、景中见情,不能将情单独抽离,或把语境甩脱,那样诗的味道就没了。所以,学理上,诗有助于把被抽离和抽象化的时间与空间重新组织、缝合起来,将人置入具体时空之域,使其与这一特定时空中的物、景、事建立连接关系,真切地体悟、经验其间明月、大川、长风、落日等之由出与呈现,与之在连接中同频、共频,产生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谓(人与世界间的)“共鸣”。如此,才能使人生发出真切的身在世中的存在感,一如李太白“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之真情抒发,自然天成……而非隔靴搔痒式的无病呻吟。所以,诗本质上是“反脱域”的,它要缝合人与物的断裂,重建并修复人与自然万物的连接,回归与物的“切近性”感觉关联(这与当代物转向思潮所倡“物性”回归之内在精神似有契合),也即使人之情再域化。当然这与吉登斯之“再域化”不同,“再域化”(reembedding)是“重新征用或重塑脱域后的社会关系,以便将它们(不管是部分的还是暂时的)固定在特定时空情境(local conditions of time and place)之中”<sup>③</sup>,这也就是脱域化之后社会关系“解码”性地落地与还原,所谓“重新进入”(reinsertion)<sup>④</sup>“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sup>⑤</sup>“具体的时空情境”(specific time-space contexts)<sup>⑥</sup>,如把物卖掉赚到钱是脱域,而用钱去买具体商品则是再域化,其运作仍围绕现代性的逻辑,即社会交往需在现代性脱域及再组合的域之下,而不是在非现代自然本真之域中展开。

诗教“反脱域”机制对语境断裂之修复,主要体现在对加速主义特有的应对上。脱掉、离开域之社

会交换与社会关系构建如同去了枷锁一般,显得轻松,速度自然加快,而“反脱域”,也即(再)“入”域情况刚好相反,速度会放缓。这也正体现出“反脱域”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指向。脱域催生全球化、加速主义与快文化,“反脱域”则使速度减慢,对应于慢文化的世界。作为“反脱域”核心机制之减速也正是古典诗学审美之基本“语速”。与现代快文化不同,诗之精神强调把节奏降下,重回既有节奏,从而有助于疗治加速主义带来的诸多病症。降下节奏就是慢下来,慢就是一点点去体验,而非走马观花。所以,它反对脱域之抽象,主张回到具体时空,重新搭建连接。当然,这似乎得益于“工具使用”阶段(a tool-using period),也即前“技术统治时代”(the Technocratic Age)<sup>⑥</sup>交通方式的缓慢行度。这种慢速给予走四方、行万里路的诗人以细致感受、体察地方风土人情之悠闲节律。如李白、苏轼等诗人遍访名山大川,在其长途缓慢跋涉中,会细致地经验脚下或柔软或坚硬之大地,也即与“此时此地”建立真切而实在的连接。诗人与自然间这种连接其实是一种特别的生命力的连接,一种海德格尔所谓“切近感”,即人与物的相互生成、互文映鉴。这是当代快文化无法提供,也拒绝担保的。因为凭借高铁、飞机带来的加速度,旅人虽出行万里之遥,但与脚下路经的区域、空间,与此时此地的感觉是悬空的、脱离的,未能带来任何切近感。慢文化于近些年的兴起正出于对快文化之反动,出现了慢电影(Slow Cinema)、慢饮食(Slow Food Movement)等文化实践,以唤回这种离失的切近感。当然也正因为切近感,慢与美二者才本然关联,这是值得特别点明的。慢文化有助于放缓脚步以把控生命节律,重拾在快中流失的生命体验与文明律动,从而感受到美。某种程度上,诗之内在精神即慢、闲。诗就是典型的慢文化,正是慢让诗人能从容感受与体验桂花之飘落(“人闲桂花落”),才“闲敲棋子落灯花”,或生出淡淡“闲愁别绪”,感悟“闲愁最苦”。换言之,慢

恰体现出审美的内在特质与核心精神,只有慢下来,才可能有品的空间、闲暇与心态,才能细致体会物之细曲,从而品出味来,真正感受到物,让物作为自身,并与物展开“间性”对话。当然,正因细品,时间方显缓慢。而快正相反,走马观花不利于审美感受的沉淀,它未给品留下足够的空间、闲暇、心态,自然不知滋味,无暇细顾,如八戒之吃人参果,显得匆忙慌乱。酒香需要沉淀、酝酿,不能即产即食,酒、茶韵之香均需慢品,且须在自我直观中品鉴得来,求快只会与个中审美滋味擦肩而过,他人转述的味道亦非咖啡、美酒本身。在此意义上,诗是闲文化、慢文化的核心代表。诗排斥快,快只会将时空抽离、脱域,从而导致人与物分离,以及宏观层面文化的时代断裂,让人之感受成为无根之抽象、散乱和难以凝聚之麻木、荒诞,或无意义感,让人无法生出“切近”感,无法在被控的节律中使生命得到自由生发。诗的精神恰好相反,首先,它有助于人回归具体(空间)实域,有助于人与大地万物建立连接,重建四元之关联,产生切近感。其次,诗的这种慢性精神因其不在意信息与利益在空间上的广泛撒播,故有助于矫正与疗治时代文化(发展)过度的空间化偏向,重拾被加速主义抛掷身后的价值理性(如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等),在文化与文明的时间维度上耕耘建设,修补人在传统语境断裂后的悬空感。再则,慢(减速)有助于人从当下社会“病态”巨机器的快节奏控制与驱动中挣脱,成为针对现代性牢笼的一支“抵抗力量”和“反抗性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据点(a center of ideological battle)”<sup>⑦</sup>,使人在获得主动感的同时亦较少受到断裂所生撕裂感之干扰,由此成为今天人们从社会巨机器中获得解救的一味良方。

#### 四、新感受

修复人与万物之连接,关键在修复人之感受力,有了真感受后每次与“域”之对接、对话必会是新的。有了这些新感受,便会有实在的连接与真切的人与

物之互映共鉴:此时此刻的一江东流水,此时此刻的青春韶华难永驻,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人生易老、壮志难酬,见“草木零落”,“恐美人之迟暮”……此时,情与景、人与物的连接不是相“脱”的,也非悬空、抽象、推理的,更非虚情、假情,而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真情实感。此处,什克洛夫斯基之“陌生化”机制恰展示出“反脱域”的重要精神,某种意义上,“反脱域”的内在精神正在于陌生化。人们习惯于脱域化的生活/思维,所以当重回具体实域(再域化)时便会产生陌生的新鲜感。如上文小女孩玩笑一例深层指向于成人在抽象化脱域思维的培养与涵化下渐失对物本身的关注与认知。熟悉的陌生感正在于重回具体时空域场,物在具体化、在场化、语境化后的展现明显别于经验层早已固化的对物无视和麻木了的脱域化认知/感知模式。正是在此意义上,“反脱域”能“让石头重新成为石头”<sup>⑨</sup>,而非被话语抽象化之后干枯的、仅作为通约性符号的“物”或“象”。“反脱域”化,因而也是反抽离具体实域的抽象化和去语境化的认知模式。

当然,参照海德格尔理论,“反脱域”所生陌生化之新感受其实是存在主义所谓“存在感”,这是此在在迈向无本质的想象中的自我之所是的生成感,一种始终在过程中的“成为”(becoming)感,人生在世由出于物、为物激活的自我的“站立”与“涌出”感。这里,尽管存在有独立性,但存在感不能单靠自我孤立生成,生命之自主性源于与世间他者之间性往来,自我之感必由出于我外之物,情须依托于景,此所谓情景交融,情与景之“间在”<sup>⑩</sup>共生。情不能离开景/境,不能离开物,而物之意义亦在于对人的依赖性<sup>⑪</sup>,以及人之瞩目与相应的感发情动。二者连在一起,意味着人之生命存在感乃由境/域“带入”,此在“被托付于这个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以情绪方式展开”,此即海德格尔所谓“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强调“此情此景的切身感受状态”。<sup>⑫</sup>存在深植于“身

在感”,存在者离不开所处语境、时代氛围,离不开身在之世,所谓人生在世,即为此意。人“现身在世”,“被触动”,“对某某东西有感觉”。<sup>⑬</sup>而所触之物,有切近性,有新物质主义所谓“物质动能”(material agency)<sup>⑭</sup>;所在之域(世),有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所谓“客观情感”(objektive Gefühl)<sup>⑮</sup>,有格诺德·伯梅(Gernot Böhme)所谓“气氛”(atmosphäre)。人与世这两重属性是理解物(域)与人对话,激活人,从而使人“站立”,“发现……自己”,让自己“现身”之核心。<sup>⑯</sup>如古诗中常出现的睹物思人、人去楼空叙事。面对滚滚长江、滔滔黄河等场景,物之“动能”“活力”,物之切近性及所含之“客观情感”“气氛”能于瞬间把苏东坡、李太白等诗人激活,《将进酒》等因之成为千古名篇。

所以“反脱域”指向人之存在,指向对人的唤醒、激活。当然联系现代文明之弊,其意义在疗治断裂时代人之异化问题。当代人情感出现异化之重要根源正在于人与景/境(即域)之脱离及时代文化与文明之断裂。诗教之“反脱域”机制正在其有助于疗治当代人在脱域/无域状态下的“悬空感”,从而在修复中体现其对断裂语境的接合功效。连接一旦修复,此在即可与“境”展开交换,获得支持、补给,并被激活,此前其因连接悬空而导致的精神危机问题便会得到缓和。诗论范围内对脱域概念的使用,其实主要就生命感、存在感需由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真实的自然性(“互生”)场域(主要是面对面)而展开。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核心精神之体现,即人之存在乃是“在世间”的动态实践(经验)与生成过程,所遭遇的“存在”(自在之物)非外在孤立于己的抽象“对象”;人不是“面对”“存在”,而是身处生活世界与“存在”发生交换关系,也即二者要相融于现实之境(或场域),人不是外在于场域而是生在场中。所以,诗人之表达就非单纯的情感抒写,更在于道出人生在世、立于境中与存在遭遇的经验感以及自己

经由生长以“站立”于自身的“生成”感,也即存在感,故其中自然含有康德等所言知情意之生成及呈现。所以,这里植根于场域中的存在感之关键机制在真情与真域。真情以避免情感之抽象化,或被中介、被生产、被人为规定之由出方式,从而与当下网络短视频等大众文化通过诱惑用户以技术性地生产情感之方式相别。真域即域是具体、真实的,而非当代文化与社会中的梅罗维茨所谓无感之域,或感受性被搅乱之混域,或臆域,如波德里亚所谓拟像化、德波尔所谓景观化之域,从而导致当下信息茧房、算法推荐,乃至后真相之情绪化思维方式等盛行。与“真情”“真域”相反,脱离事件的此时此地性,或凭借某种中介/代理与场域建立连接,则为脱“域”,这在诗教上颇类似于古诗论中的“隔”,即感与境的非同一性问题。感非由境自然引发,由此显得其并非有机生长于境中,感情因而显得不真实、真切,与此同时,域之有机性亦受到质疑,因此“诗家三昧”在呼唤“不隔”。易言之,人之异化即物化,物化表述颇具隐喻色彩,物为人之异在,喻指像物一样无生命、无情、无活力,人由此非生命化、非人化。卢卡奇在物化问题上有经典论断,“工人的劳动力……变成一种物,一种他在市场上出卖的对象”<sup>⑧</sup>,变成物也就是物化、“非人化”、“自我客体化”。<sup>⑨</sup>与人之物化互为连理与比照的,常常是物过分的人化,也即受到人的因素的过度干扰、介入与破坏,物被对象化、客体化,导致物性丢失。卢卡奇援引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这种合理的客体化”其实掩盖了物的“直接物性”,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取而代之则是“一种新的物性”“一种新的客观性”。<sup>⑩</sup>物之异化其实是二元律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物之被“戮杀”,在此意义上,物之“修复”问题意义重大,构成了对文化与思维范式的批判性重思和使人回归自身的一种重要协同。那如何修复?庄子提出“物化”,海德格尔提出“物物化”(the thing things),即以物为物,将物视为其本身,而非

人话语、观念下所“造”之物。人之所造其实早已远离物之本真,故庄子提出“丧我”,海德格尔提出“大地化”,其意正在于祛除过度的人化,去掉压抑客体的二元律思维及人类中心主义。当物重归物本身,由物所构之人的存在之“域”也就成为本真之域,成为人诗意的栖居地与存在家园,成为让人重归其所是之处所。由此物之修复与人之回归连理携手,相互玉成。

所以,“反脱域”意在认清“新”域之“伪”域性,回归真实具体的(空间)实域(是真域,未必是旧域),其间关键在重建连接,重新回归人与天地人神之本然连接,重建与大地的兴发感动,重筑前脱域时代时空的间性关联,有机生长,而不是让自己居住在一个空中楼阁式的伪“域”,在切断与大地的连接过程中悬空蔓延,从而引发精神危机之痛苦。连接一旦被修复,意义和终极目的等传统价值理性问题便会重驻视野。这样,人和自然该如何对话,如何互文构建,自然是什么,人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自然重入场域,受到关注。

另一方面,“反脱域”对人之修复可作为修复时代语境断裂的一个关键点。诗对时代共同体施力不是直接发出,而是通过结构性影响个体之方式间接影响宏观整体。个体一旦得到修复,其在面对文化与文明时代性断裂时便不至因被动而感惊诧与无所适从,或在对断裂的哀叹、悲观中麻木顺应,而是主动面对,积极寻找断裂背后传统与当下之关联性与连续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断裂的修复是(简单)回归传统,而是主动面对变迁,带有反思性地适从变迁。诗教所能做到的,便是帮助人在应对与处理断裂感时与自然万物融合相处,生出积极应对之心态,一如古典美学所谓“涤除玄鉴”“澄怀观道”“凝神遐想,妙悟自然”“同自然之妙有”等。当代人的断裂感常出自人的被动感,当被动感经批判性目光与智慧审视与化解后,焦虑与异化便会得到相应缓解。当

然,这是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理论上,需要每个个体而非部分个体之积极主动心态作为配合,也即需要一种主动的广泛参与与对话性的在面对时代结构性进展时的预见、把控作为应对方案。

总之,修复断裂之核心元素有二,一为域,二为人。域之重要性显而易见,域影响个体情之生成、诗意由出、(进而)人之生成,从历史发展宏观来看,影响到以脱/离域为出发点的现代性之走向。所以,域之重归与真域之修复或重建对诗意、对人、对文化文明时代断裂语境之弥合,都是基础性的必经环节。人之重要性亦毋庸置疑,人是文化、文明的参与者,是历史与时代前行的“主体”。所谓异化感,或自由感,莫不是人的感受与体会。所以,断裂性之修复最终会落脚在人对断裂之感觉、感受的修复。时代前行之列车无可阻逆,人的心态却可由被动转为主动,人之适从可由病态无奈转为积极干预,所以人之“重建”问题对于语境修复与断裂弥合意义重大。这两个因素中,对人的修复是入口,也是关键;修复断裂是通过修复人展开的,一则以“真情”“新感受”,以罗萨所谓与世界“共鸣”<sup>⑨</sup>的方式修复异化(如疗救其悬空感);二则以主动适从的积极态度重新调整人对断裂感的感受。从域的角度看,通过让人回域、再域疗治异化同时,亦有助于缓和断裂。因为断裂之发生缘于离域、脱离大地,故重回大地、返域有助于弥合断裂之隙缝。这两方面之修复结合起来,构成了诗教以“反脱域”机制介入并在学理上修复/弥合现代性断裂,以之作为“手术”方式对当代文明病态之躯进行疗治的两层核心机制与可能性方案。

今天,脱域机制早已深入社会肌理深处,遍布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购物、消费、传媒、社交、计时、地图等活动中莫不有脱域行为,衣食住行等背后均有专家系统,若将之机械照搬到诗的话,“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岂不成了脱域行为,岂不有违“诗意”?另则,书写本身因使用符号莫非也是脱域行为?如果这样机械地论诗的话,会陷入逻辑上的尴尬,且使探讨显得空洞无意义。所以,在理解古典

诗歌、诗教“反脱域”问题上不能机械套取吉登斯概念。吉登斯概念主要针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社会要发展,就需从个体性的事件中抽取出一般性的交流、组织、交换法则,脱离有形之“域”,以求取社会交往、社会连接在数量、广度、深度、效率等层面的增长与发展,这也正是前文所说现代性发展的核心机制。尽管脱域会导致文化与社会诸问题发生,但脱域行为/机制本身乃中性的,非否定性语汇。诗歌中的“反脱域”并不意味它是一个否定性和批判性概念,而是在差异化层面阐释的语用学表述,主要是强调诗歌创作的具象性、事件性、语境性特质。这正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特征。诗歌创作及诗教中学诗、赏诗的训练提倡的即是具体的此时此地独特的事件性,不鼓励从这些事件性中抽离出一般性的可利用、可交换、可组织、可交流的抽象通用之物。如果都抽象化了,那么语言就会走向自动化,情感的抒发走向机械化,这就意味着诗意的丢失、意味着“隔”、意味着审美性与文学性的消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主张中华诗教所具之“反脱域”机制不是提倡诗歌要反社会发展,或者反现代性,而是对吉登斯概念的化用与反向拓展,在此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对吉登斯理论的特殊续说。吉登斯未必注意到这样一种使用方向,也未必理解在此基础上“反脱域”可能构成一种应对现代性病症的学理方案,尽管其所提概念具有启发性与开放性。

就“反脱域”对现代性病症之应对与疗治而言,中西情况颇有差异。从西方看,法兰克福学派等学者多采用以审美为疗救/革命的方式来应对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现代文明之积弊。可惜的是,其审美革命之梦想不过是一场镜月水花般的幻梦。因为在阿多诺时代的文学艺术语境中,艺术往往在重思辨、情感抽象、形式标新立异、重“震惊”感等层面致胜,缺乏一个类似中国古诗一样地位稳固且具“反脱域”机制、重视人与具体时空情境建立连接的关联性情感唤起与表述方式。中华诗教这一特殊功效正好可在现代化建设中绽放价值。眼下,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如火如荼,具体生产实践中,理应考虑现代性脱域导致的诸多社会病症,以西方现代性之弊为镜鉴,充分发挥中华诗教在“反脱域”问题上积极的与建设性的价值与功用,以充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案,助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当然,本文所涉文化与文明的时代断裂是个宏大且复杂的问题,吉登斯的阐释也仅是一家之言,更何况在弥合断裂时所谈中华诗教的“反脱域”问题到底有无效果,即便产生了修复与疗治效应,其作用力机制亦是相当复杂,远非一个简单的探讨所能解决。所以本文所谈不过是在这些宏大问题中择一视角,以“脱域”入手窥得中华诗教与现代性“断裂”两个看似没有关联的问题间可能存在的学理关联,并由此获得对传统诗歌、诗教问题之新审视。

#### 注释:

①吉登斯所用“transformation”指的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断裂性变迁”,变迁中有“断裂”之意,而“transition”“change”等语汇只有变迁、过渡而不断裂之意。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②吉登斯将现代性比喻为“怪兽”(juggernaut),“一个功率巨大却难操控的发动机”,它是一种向前移动能铲平前行路途上所有阻碍的不可阻逆的力量,“人类虽可在一定程度上驾驭它,它却可能失控并将自身撕裂产生威胁……但只要现代性制度持续存在,我们就永难完全控制前行的道路与步伐。并且我们会失去安全感,因为怪兽可能将我们带入充满严重后果的风险之地。”(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39)

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21.

④其实,查数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脱域化案例。据柏拉图说希腊联军主帅阿伽门农不会查数,不知自己部队有多少步兵,理论上,他无法将数字从具体实物对应中抽离出来,也即他无“脱域”能力。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4页。

⑤类似的表述还有“虚化”时间(“empty” time)、抽象的时间(abstract time)、虚化的时间(emptying of time)等。

⑥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40.

⑦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8. 无空间与地域限制的连接,如网络中的连接,会导致“空间虚化”,网络空间中的连接在此意义上多具脱域性。比如,网络连接有助于人从某实域中“脱”出,并轻松进入另一个并行“场域”,形成“场景融合”。这种脱域化的连接有助于生成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谓“场景融合”现象,成为空间虚化时代(即趋零距离时代)重要的文化表征。比如,一个人当其边开网络会议边看微信朋友圈并作点评回复时,他便处在一种复杂的脱域化状态。

⑧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80.

⑨Robert McNamara:《Why We Have Time Zones/时区是怎么来的》,颜丹选译,《中学生英语》2020年第11期,第22—25页。

⑩爱德华·霍尔、刘易斯·芒福德、尼尔·波兹曼等学者对此均有论述。

⑪Robert McNamara:《Why We Have Time Zones/时区是怎么来的》,颜丹选译,《中学生英语》2020年第11期,第22—25页。

⑫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20.

⑬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53.

⑭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6.

⑮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20.

⑯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79.

⑰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64.

⑱吉登斯原话为“现代性动力的三种来源”,前文所谈及“三种来源”中的两种,另一种为“自反性”(reflexivity)(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63),为免重复,挪至后文述及。逻辑上看,本部分(即“脱域”部分)强调空间问题,“断裂”部分强调时间问题(“自反性”问题属时间问题),整体上不影响对脱域与断裂话题的理解。

⑲即吉登斯所谓“本地化语境”(localised contexts)、“本土

语境”(local context)、“具体情境”(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社会活动的语境与背景”(circumstances and contexts of social activity)、“面对面交流语境”(given situation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特殊的地域性情境”(“situatedness” in specific locales)、“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local contexts of interaction)、“地域性情境”(the local circumstances of place)、“语境的直接性”(the immediacies of context)等。

②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6.

②或译“全球在地化”,戴维·哈维、罗兰·罗伯逊、齐格蒙特·鲍曼、阿莱斯·艾尔雅维茨等对此有深入论述。

②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p. 3-4.

②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53.

②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7.

②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09.

②“亲近”和“切近”是对海德格尔德文“Nähe”(英译为“nearness”)的两种中文译法,彭富春译“亲近”,孙周兴译“切近”。

②Heidegger, M.,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p. 163-164.

②Heidegger, M.,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p. 165-166. 此处参考彭富春的翻译[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②[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4页。

③R. D. Laing,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Penguin Books, 1990, p. 17.

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71.

③当代精神危机的核心其实在文化与社会之空间偏向过甚。当代人过于重视空间建设,而忽略时间建设,且时间建设某种程度上亦被空间化。当代人的时间不是在细致、慢速、耐心体验与体味中经验生命的律动,而是被切割、转化,以资本、物质之累积与消费为旨归。“空间偏向”一词,本源于哈罗德·

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后兰斯·斯特瑞特(Lance Strate)结合阿弗里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time-binding”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Lance Strate, *On the Binding Biases of Time and Other Essays on General Semantics and Media Ecology*, TX: Institute of General Semantics, 2011.

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p. 79-80.

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41.

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6.

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p. 141.

③这两个词是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一书用语。波兹曼将历史按技术文化类型分为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时期,“工具使用”阶段意指17世纪前的技术发展阶段。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1993.

③该观点出自德国学者彼得·格罗茨(Peter Glotz)1998年发表的论文《减速批评》(Kritik der Entschleunigung),该文被选入Backhaus与H. Bonus的合编著作《加速的陷阱抑或龟速的胜利》(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Hartmut Rosa, “The Speed of Global Flows and the Pa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No. 4, 2005, pp. 445-459.

③此话出自什克洛夫斯基,他说:“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④“间在”是中国学者金惠敏提出的概念,意指生命与文化等存在乃是以个体间相互联系、沟通、互给、交换等为基础与前提。间在即“inter-being”,是在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intercorporeité(英文 inter-corporeality, 身体间性)、inter-individuality(个体间性)、inter-otherness(他者间性)等思想基础之上,在与诸如对话自我(dialogical self)、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间性论(interality 或 interalogy)等比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论。间在强调存在与周遭万物间平等、互文、互相承认和尊重的对话关系(李勇:《什么是“间在论”?——论金惠敏对当代对话理论的新发展》,《中国比较文

学》2022年第4期,第40—55页)。

④1现象学之表述方式,即物之存在依赖人之目光、阐释,才能由“存在”成为“存在者”被理解、接纳。

④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56—157页。

④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161页。

④4“物质动能”(material agency)是新物质主义一个重要的甚或核心性的理论假设,代表性论者及观点如简·本内特(Jane Bennet)2010年《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中的“动能”(agency, vitality)问题,比尔·布朗(Bill Brown)“物之力量”(thing power),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行动元”(actants)等,认为“世界是由物构成,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界都是物,任何物都具有‘动能’”,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活力’”,这一动能对人的情感、思想等能产生无形的感动、促进、威胁和构造性力量。该术语所以被新物质主义论者论及,旨在从本体论层面消解“无机和有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区别”,拆除“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同时排除人类特权,由此将物的力量和价值凸显出来(韩启群:《新物质主义》,《外国文学》2023

年第1期,第111—124页)。

④5[德]格诺德·伯梅、杨震:《伯梅气氛美学访谈录》,《外国美学》2019年第2期,第266—284页。

④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158页。

④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第224页。

④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第140页。

④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第140页。

⑤0“共鸣”(resonanz)是德国批判学派学者哈特穆特·罗萨的重要概念,《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一书有提及,《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2016)一书(该著尚未有中文译本)对之进行专门研讨,是该著核心概念。罗萨的观点大致可以理解为,加速社会导致人的新异化,异化之关键在人与世界连接的脱离,故可能性疗救方案在重建人与世界的“共鸣”与连接关系。

## Bridging Modernity's "Rupture": The "Anti-Deterritorialization"

### Mechanism of Chinese Poetry Education

Li Yong    Li Jiao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ty,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have experienced a rupture with tradition during periods of transition. In the eyes of sociologist Anthony Giddens, this rupture occurs due to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modernity's "deterritorialization" mechanism. Modern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does not directly cause this rupture; rather, it initiates deterritorialization, which subsequently affects the trajectory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his sociological issue is thus associated with the field of poetic "education", and the topics of poetry and poetry education are revisited, stemming from the potential positivity and constructive value of its "anti-deterritorialization" mechanism in repairing and healing this "rupture". In essence, in addressing the rupture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caused by modernity, as a reverse deduction of Giddens' theory, the "anti-deterritorializ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poetry education theoretically provides a path and solution.

**Key words:** Chinese Poetry Education; "Anti-Deterritorialization";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s "Rupture"; Deterritorialization